

守文脉之根 续城市之魂

听 海

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,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。古人讲,“万物有所生,而独知守其根”。中华文明延绵至今,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。

——《延续城市历史文脉,保留中华文化基因》(《习近平文化文选》第一卷)

“万物有所生,而独知守其根。”语出汉代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,这一箴言道出:根脉是生命存续的本源,也是文明延续的密码。

文明根脉永续,文明方能生生不息。一座座古城、一条条街巷、一处处遗存,都是文明基因的具象载体,镌刻着民族的生存智慧、人文风骨与精神底色。

城市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,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。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,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。城市精神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色风貌。

城市作为文明的载体,建筑街巷、民俗风物是文明存续之根。古人营建城市,不是单纯地构筑城池,而是将文脉融入城市格局。长安的坊市规划、洛阳的山水营城思路、姑苏的园林雅致,无不兼顾人居需求、礼制秩序与自然意趣,于城市营建之中承载文化根脉。守根续脉、赓续基因,方能在时代变迁中守住城市独特气质,让千年中华文明在城市肌理中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城市文脉的存续,贵在坚守传承,在保护遗存中

探析文化志愿服务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的实践

汪楚妍

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:“任何文化要立得住、行得远,要有引领力、凝聚力、塑造力、辐射力,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。”这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设的本质。文化不能仅靠外部输入,而应着眼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与巩固。

文化志愿服务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转变的紧迫性

长期以来,乡村文化供给面临一些困境。传统乡村中,宗族活动、节庆仪式、邻里互助构成了传承的载体,村民在其中既是参与者也是生产者。然而,随着村庄人口流动加剧等因素,这些载体日渐消散,而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尚待更有效建立。在此背景下,“送文化”模式能在短期内填补空白,但在某些地区难以真正嵌入群众的日常节律。群众坐在台下当观众,本土文化能人却缺乏成长空间,传统技艺后继乏人,文化生产主体性缺位,城乡文化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。即便有外部输入,也因缺乏与之匹配的本土承接能力而难以持续。破解这一困境,关键在于以文化志愿服务为切入点,在“外部介入”与“本土生长”的张力中寻找动态平衡,激活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。

文化志愿服务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的实践路径

近年来,文化志愿服务从“送文化”走向“种文化”,呈现为“空间可及-主体培育-价值内化”的递进。

一是空间可及,以流动服务打破地理阻隔,搭建参与入口。偏远地区的群众往往因地理阻隔而难以享受文化服务,流动服务创造了一种低门槛、高包容的公共文化场域,提升了服务的可及性。部分地区设立“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”,组织志愿者以巡回方式开展政策宣讲、文艺演出、便民服务,让文化资源打破场所限制,送达群众身边。同时,志愿者结合本地风土民情编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,以群众熟悉的语言传递文明理念并引导群众参与其中,使文化展演从“坐在台上看”演变为“自己演、一起看”,群众积极参与,成为表演的

主角。流动服务打破了空间距离带来的疏离感,使地理阻隔在共同参与中被消解,群众从“被动等待”转向“主动靠近”,文化认同也在参与实践中得以生成。

二是主体培育,以外部催化激活本土力量,完成承接。文化志愿服务的价值在于外部专家、文艺工作者以“催化”而非“替代”的方式进入乡村,与本地老艺人、文化能人协作,共同挖掘和整理本土文化资源。外部催化之所以常常失效,其根源在于外部资源的“标准化供给”与本土文化的“差异化实践”之间存在错配。有效的催化需要从“外部专家教村民做什么”转向“外部资源帮村民做他们想做的”。比如,通过外部理念引导,挖掘本地非遗资源,开设“非遗课堂”,以外部资金撬动本地人参与日常运营,形成“外部指导-骨干孵化-群众参与”的延续。当文化活动由本地人组织、本地人参与、本地人传承,文化便从外部“输血”转化为内部“造血”。

三是价值内化,以民生服务为载体,将价值引领融入日常实践。文化志愿服务不能仅停留在“送演出、送图书”的浅层服务,而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,使广大村民在解决实际需求中自然感知、认同并内化价值理念。部分地区以解决留守老人“吃饭难”为起点,设立助餐食堂,由本村志愿者承担日常服务,实现生活照料与人文关怀的一体化。借“一餐饭的温情”将传统美德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实践,文化引领便不再是一句口号。同时推行积分激励制度,将遵纪守法、家风建设、志愿服务等行为量化激励,让价值倡导转化为可积累、可兑换的个人获得感。从“制度约束”到“习惯养成”,价值引领与生活照料双向贯通,最终将外部倡导内化为群众自觉的价值取向。

文化志愿服务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的实现机制

文化志愿服务的三条路径,其逻辑可以归因为“三重机制”的协同作用:一是资源互补机制,即外部

资源和地域特色。北京作为千年古都,完整保留中轴线风貌、胡同肌理与四合院格局,让古都文脉在城市更新中代代延续;苏州完整留存古城水系、园林群落与街巷格局,让“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”的江南文脉穿越千年。敬畏历史遗存、守护文明根脉,才能留住城市的独特基因。

当然,“守根”不是墨守成规、固步自封,让历史文脉融入当代生活、赋能城市发展,文明基因才能真正活起来、传下去。近年来,成都深挖巴蜀文脉底蕴,将历史遗存保护、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有机统一起来;泉州保护修缮古码头、古街巷、古寺庙,传承海洋商贸文化,让千年海丝文脉成为城市发展的独特标识……这些实践生动诠释了文脉传承既要守住文化之魂,也要激活创新之能,让文明基因融入城市血脉。

延续城市历史文脉、保留中华文化基因,既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担当。我们要始终坚守文化本源、深耕文脉传承,让城市在赓续文脉中涵养气质、在传承文明中积蓄力量。

资源与本土资源的互补性匹配,以外部力量激活本土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和再创造,以流动服务和专家指导为起点,打破地理与心理的双重隔阂,为乡村文化供给打开新的可能性空间。

二是组织建构机制,即本地志愿者的组织化建构,形成“外部指导-骨干孵化-群众参与”的新进路径,将外部资源转化为本土组织的运营能力确保文化活动中从“有人送”变为“有人种”。

三是主体性生成机制,即群众文化生产主体性的生成,让群众在持续参与中唤醒文化自信,文化生产不再依赖外部驱动。群众成为文化的“主人”,主动提出需求、自发组织活动、自觉传承技艺,这种自发的文化活力才能吸引更多外部资源关注与投入,并进一步扩大参与面。

在上述三重机制中,文化志愿者是贯穿始终的行动主体,他们既是资源互补的“转换器”,也是组织建构的“重要节点”,更是群众主体性生成的“推动者”。三重机制在不同阶段各自主导、协同发力、循环推进,资源互补奠定物质基础,组织建构提供制度保障,主体性生成注入内在动力,共同完成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的实质性转变。

由此可见,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的一条有效路径,在于培育出一支扎根乡土、群众信赖、持续行动的文化志愿者队伍,从而让文化从群众日常生活生活实践中自然生长出来。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,实际也是重建乡村的文化共同体,让每位村民在参与中确认自身文化价值,在创造中实现精神富足。唯有如此,乡村文化振兴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。

〔作者单位: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马克思主义学院;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研究专项任务项目(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)“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”(项目编号25JD710011)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〕

对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,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仍存在一些问题。

一是供需匹配错位问题。某些地区文化服务仍沿用“自上而下”的供给模式,依托固定模板开展文艺演出、讲座展览等活动,忽视城乡差异、年龄差异、群体差异,老年群体适配活动扎堆、青少年特色活动供给不足,城市文化资源富集、乡村优质资源稀缺,同质化供给难以满足多元需求。

二是资源统筹整合力度不足。公共文化资源存在碎片化、分散化问题,图书馆、文化馆、乡村文化服务中心资源独立、各自为战,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不畅,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、直达群众的渠道不够通畅。数字化文化资源存在平台割裂、数据不通、更新滞后等问题,数字赋能优势未能充分释放。

三是运营服务机制不够健全。部分基层文化阵地存在“重建轻管”现象,专职工作人员力量薄弱、专业素养不足,常态化运营、特色化打造、精细化服务能力欠缺。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有限、激励机制不完善,过度依赖政府单一投入,多元协同、共建共享的服务格局尚未完全形成。

四是评价激励体系相对滞后。传统考核侧重阵地数量、活动场次、覆盖人数等量化指标,忽视群众体验、服务实效、文化赋能等质效指标,容易催生形式主义,难以倒逼服务质量持续提升。

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“有”的

基础迈向“优”的质变,必须立足惠民利民导向,遵循需求导向、精准赋能、多元共治、提质增效的原

从『有』到『优』：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逻辑进阶与惠民指向

汪如磊

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、改善文化民生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,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。做好公共文化服务,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,保障人民文化权益。近年来,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较快,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体制机制创新深入推进,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持续提升。同时也应看到,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相比、与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期待相比,公共文化服务仍有差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第三十四章明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、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、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、发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等重点任务,清晰划定公共文化服务从覆盖达标向品质升级转型的路线图。因而,厘清公共文化服务从“有”到“优”的内在逻辑,现实堵点与实践路径,坚守文化惠民的根本价值导向,是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、助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、夯实文化强国建设基层根基的核心命题。

从“有”到“优”的迭代升级,根植于时代发展、需求变革与治理升级的三重内在逻辑,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。

其一,这是社会发展的民生逻辑。曾经有一段时期,公共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兜底保障、补齐短板,解决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,实现文化服务普惠性覆盖。如今,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多样化,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标准化、同质化的基础服务,更加注重文化体验感、参与感和获得感,对特色文化供给、沉浸式文化体验、精准化文化服务提出更高要求。供需结构的深刻变化,倒逼公共文化服务必须跳出“全覆盖即高质量”的认知误区,推动服务供给提质增效。

其二,这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。前期公共文化建设以硬件铺设、阵地搭建为核心,快速构建起全域服务框架,但也在某些地区形成了重建设轻运营、重投入轻效益、重供给轻需求的惯性问题。部分基层文化阵地存在闲置空转、资源浪费、活动形式单一等现象,设施利用率不高、服务效能偏弱,治理精细化不足的短板逐步凸显。推进从“有”到“优”的转变,本质是公共文化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,从粗放式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效能提升,从单向行政供给转向多元协同共治。

其三,这是文化自信培育的价值逻辑。文以载道,以文化人。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民生服务工程,更是意识形态建设、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载体。基础覆盖阶段侧重文化普及、氛围营造,而提质增效阶段更注重挖掘文化内核、传承地域文脉、赋能精神育人,通过优质、鲜活、接地气的文化产品与服务,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红色文化、新时代主流价值浸润人心,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凝聚社会共识、厚植文化自信。

对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,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仍存在一些问题。

一是供需匹配错位问题。某些地区文化服务仍沿用“自上而下”的供给模式,依托固定模板开展文艺演出、讲座展览等活动,忽视城乡差异、年龄差异、群体差异,老年群体适配活动扎堆、青少年特色活动供给不足,城市文化资源富集、乡村优质资源稀缺,同质化供给难以满足多元需求。

二是资源统筹整合力度不足。公共文化资源存在碎片化、分散化问题,图书馆、文化馆、乡村文化服务中心资源独立、各自为战,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不畅,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、直达群众的渠道不够通畅。数字化文化资源存在平台割裂、数据不通、更新滞后等问题,数字赋能优势未能充分释放。

三是运营服务机制不够健全。部分基层文化阵地存在“重建轻管”现象,专职工作人员力量薄弱、专业素养不足,常态化运营、特色化打造、精细化服务能力欠缺。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有限、激励机制不完善,过度依赖政府单一投入,多元协同、共建共享的服务格局尚未完全形成。

四是评价激励体系相对滞后。传统考核侧重阵地数量、活动场次、覆盖人数等量化指标,忽视群众体验、服务实效、文化赋能等质效指标,容易催生形式主义,难以倒逼服务质量持续提升。

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“有”的基础迈向“优”的质变,必须立足惠民利民导向,遵循需求导向、精准赋能、多元共治、提质增效的原

则,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、系统化的升级路径,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扎根基层、浸润民生。

首先,坚持需求牵引,推动供给模式从“大水漫灌”转向“精准滴灌”。惠民的核心是贴合民心、契合需求。要打破固化的标准化供给模式,建立常态化群众文化需求调研机制,精准摸排不同年龄段、不同群体的文化偏好,针对老年人打造康养文艺、传统戏曲、数字科普服务,针对青少年开设美育课堂、非遗项目体验、红色研学活动,针对新业态群体提供轻量化、碎片化文化服务。深度挖掘地域特色文化资源,盘活本地非遗技艺、民俗文化、红色资源,打造本土化、特色化、品牌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,摒弃“千城一面”的同质化服务,让公共文化既有普惠温度,又有地域厚度。

其次,强化数字赋能,推动资源配置从“分散闲置”转向“集约高效”。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,整合各类公共文化数字平台资源,破除数据壁垒、打通资源通道,构建全域联动、资源共享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。依托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群众文化偏好,实现文化资源智能推送、供需精准匹配,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跨区域、跨层级下沉乡村、覆盖社区。同时摒弃重技术、轻内容的形式化建设误区,聚焦实用实效,丰富数字展览、云端课堂、线上展演等优质内容,完善基层数字文化设施配套,缩小城乡数字文化差距,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。

再次,健全协同机制,推动治理格局从“政府独办”转向牵头、统筹、监管。破解基层服务力量薄弱、资源不足的难题,关键在于激活社会活力。政府立足统筹规划、政策保障、监督考核核心职能,精简优化流程、完善扶持政策,降低社会力量参与门槛。积极引导文艺团体、非遗传承人、社会组织、志愿者队伍参与开展专业训练、培育本土文化骨干、民间文艺人才,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层力量,让专业人干专业事。

最后,完善评价体系,推动服务导向从“重形重量”转向“重质重效”。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、兼顾质量与效能的综合评价体系,强化单纯数量考核指标,将群众体验感、活动实效性、文化传播力、阵地利用率纳入考核范畴。构建常态化督导整改、动态优化提升机制,以考核倒逼整改、以评价推动提质,杜绝形式主义服务。坚持开门办文化,畅通群众反馈渠道,主动倾听群众意见建议,形成“需求收集-精准供给-效果反馈-优化升级”的闭环机制,让公共文化服务始终贴合群众期盼、紧扣时代需求。

〔作者系新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。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“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效衔接研究”(项目编号:2023ZSZ026)成果〕